

抗日战争时期中美合作所论析^{*}

洪小夏

内容提要 中美合作所是抗战时期中美两国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背景下建立的一个抗日军事合作机构。但过去由文学影视作品给人造成的印象,似乎是一个美蒋反动派勾结的集中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渐有人为其正名。但长期宣传形成的影响并未消除;而该机构在抗战中究竟有何作为?各相关文章又语焉不详。本文首先概述中美合作所成立的目的、过程、协定文本和组织机构;其次介绍其重要活动之一——培训敌后游击干部;再次略述各培训机构结业之后组建的中美联合游击队在敌后的抗日活动。最后对中美合作所作出综合具体评价,希望消除误解,还原历史。

关键词 抗日战争 中美合作所 培训游击干部 中美联合游击队

一 问题的由来

中美合作所是抗战时期中美两国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背景下建立的一个抗日军事合作机构。但1950年代以后,由于政治上反美宣传的需要,原址设立革命纪念馆的长期展览(包括到全国的巡回展览),小说《红岩》、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等文学影视

^{*} 本文系作者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国民党敌后抗战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5JA770021。另承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陈印昌协助搜集部分研究动态资料,特致谢忱。

作品的渲染, 该机构曾长期被冠以“集中营”的恶名, 成为“美蒋罪行”的代名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逐渐开始有人为其正名, 指出: 中美合作所并非是一个集中营, 而是中美军事情报合作机构; 它早已在抗战胜利后不久撤销, 与 1949 年重庆解放前夕发生在同一地点由国民党实施的大屠杀没有任何直接关系。^① 但是, 这些正名文章存在两点不足: 第一是它们着重论证中美合作所不是“集中营”, 而没有说清楚中美合作所究竟在抗战中有何作为, 开展了哪些活动; 因此说服力还不够强, 纠正人们头脑中几十年宣传形成的误解还不够有力; 以至迄今仍在电影记录片、电视历史文献片以及历史展览和文学作品等中屡屡出现“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字样。二是这些论文对中美合作所的性质认定还未完全到位。因为中方的合作单位是军统, 所以一般误认为该机构仅是情报合作机构, 而忽视了该机构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大量活动。

本文主体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概述中美合作所成立的目的、过程、协定文本及组织机构; 其次专门介绍其成立后的重要活动之一——培训敌后游击干部, 全面介绍该所在各地设立的培训机构以及各机构的培训内容等(这一部分因机构繁多, 只能简略描述); 再次描述各游干班培训结业之后的活动——中美联合游击队的组建及在敌后的抗日活动(这一部分由于内容很多, 也只能择其要者举例说明)。本文的主题: 首在论证中美合作所是一个抗日机构而非反共机构; 其次阐明它不仅是一个情报合作机构, 而且是一个更为

① 为中美合作所正名的代表作, 较早的有原在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编研室工作的邓又平撰写的《简析“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国研究》1988 年第 3 期; 近年的有: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何蜀的《文艺作品中与历史上的中美合作所》,《书屋》2002 年第 7 期; 何蜀:《中美合作所的本来面目》,《炎黄春秋》2002 年第 10 期; 孙曙:《党史小说〈红岩〉中的史实讹误》,《炎黄春秋》2004 年第 1 期; 何蜀:《关于“中美合作所”的一个误解》,《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06 年 12 月 18 日等。

广义的军事合作机构。希望能澄清史实,消除误解,还该机构以历史本来面目。

二 中美合作所的组建

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轴心国军事同盟条约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很明确:支持中国抗日,反对国共内战。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加大了援华力度并加快了与中国合作的步伐。1942年初,美国海军舰队训练处督导兼海军内部管制委员会主任李威廉(Willis A. Lee)上校,向海军军令部长兼大西洋舰队总司令金(Ernest J. King)上将建议说:日军必将很快攻占东南太平洋沿海地方和重要岛屿以孤立美国;美国则应以海军为主力,适当配合空军,先歼敌于海上,方可决定胜负;而能够为美国海军提供东南太平洋气象和军事情报最理想的地方,就是中国;因此美国海军应尽快派人到中国去搜集情报。金上将接受了李上校的建议,很快召见海军内部管制委员会记录官梅乐斯(Milton E. Miles)中校,派他以“美国海军驻华观察员”的身份到中国去,任务是:尽快在中国建立一些基地,准备接应美国海军于三四年之内在中国沿海地方登陆;同时尽力协助海军,骚扰敌军。梅乐斯行前的某一天晚上,金上将还和李威廉(此时刚晋升了少将)、梅乐斯、中国驻美大使馆副武官(同时是军统美国站站长^①)肖勃4人,为保密特换上便衣,在“华盛顿大酒店”专开一房间,开会商讨美国

①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沈醉、文强:《戴笠其人》,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70页。

海军与中国情报机构合作的具体内容。^① 经商讨决定: 由美国供应技术、器材、械弹, 由中国提供人员, 在中国沿海及敌后沦陷区, 建立水雷爆破站、气象站、情报站、电讯侦听站、行动爆破站等, 共同对日作战。会后由梅乐斯根据会谈内容起草了《中美友谊合作计划》, 报经美国海军部批准并征得中国蒋介石同意。^②

梅乐斯于 1942 年 4 月 5 日离美启程, 转经巴西、印度, 于 5 月 3 日飞抵重庆。^③ 5 月 26 日至 7 月 19 日, 梅乐斯在戴笠的亲自陪同下(因时值浙赣战役期间, 戴笠未全程陪同), 绕道湖南、广东、江西, 深入福建、浙江沿海沦陷区敌后考察。回到重庆后, 梅氏对军统局在敌后的力量评价很高, 更坚定了选择军统作为美国海军完成前述作战任务合作对象的决心。他撰写了东南之行的考察报

① 关于这次会议的细节, 主要参考[美]梅乐斯《另一种战争》上册, 台北新生报译本, 1981年第3版, 第41页。此书是梅乐斯生前撰写的回忆录。梅氏1946年从中国回到美国后, 整理中美合作所资料存入美国海军史政组, 1958年退役后取出, 然后用三年时间闭门撰写此回忆录, 刚完成初稿即于1961年病逝。此书英文版1967年10月出版; 台湾当年11月即翻译并开始在《新生报》连载, 1969年由该报结集出版单行本第1版。此书是中美合作所美方当事人观点的代表作, 提供了很多细节材料。

② 本段除另注外, 主要参考三种资料: (1) 张需芝:《戴笠与抗战》, 台北“国史馆”, 1999年3月初版, 第318页。此书是张需芝在香港私立珠海大学文史研究所1982-1983年所作的博士论文, 10多年后才在台湾出版。张氏是越南华侨, 原台湾“国防部”情报局高级干部, 得以充分利用当时和至今都未向台湾学者开放的台湾情治系统内部资料, 此书代表了台湾情治系统的资料 and 观点, 但学术性、准确性高于一般军统人员的论著。(2) 梅乐斯:《另一种战争》上册, 第36-38页。(3) 费云文:《中美合作抗日秘录》(一), 台北《中外杂志》1984年第35卷第2期。费氏为台湾学者, 长期旅美, 是研究中美合作所的专家, 可代表台湾学术界和旅美华人界对中美合作所研究的最高水平。

③ 《中美合作所志》, 第7页, 台北“国防部”情报局, 1970年3月编印, 第7页。转自张需芝《戴笠与抗战》, 第320、321页。

告,并就在中国开展有关工作提出建议,获得海军部的批准。^①中国方面,军统随即成立了“中美合作筹备处”,办公地点设在前重庆市长官邸,被称作“神仙洞”的一幢楼里^②,一边开始工作,一边起草《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工作草案》和《组织大纲》。9月初,美国海军根据《友谊计划》选派的第一批专家7人抵达重庆,第一批器材也经印度运抵。戴笠遂将重庆郊外磁器口镇西南歌乐山脚下军统巢丝厂办事处附近的钟家山一带^③,划为中美合作所的办公场所,将原军统白公馆监狱犯人迁往渣滓洞(渣滓洞原无监狱),而将白公馆监狱装修改建成外宾招待所(称作第三招待所)。新成立的美国战略业务局^④首任局长邓诺文少将希望把中美这一情报合作计划纳入自己管辖的范畴,遂任命梅乐斯兼任美国战略局驻中国主任。^⑤后经戴笠、梅乐斯请示蒋介石,决定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应有书面协定,最好由两国元首或高级官员签署。^⑥

经梅乐斯提出原则,军统局情报处长鲍志超撰写初稿,毛人凤、郑介民、唐纵等人审查、修改,报请戴笠核准;再经蒋介石和罗

① 《中美合作所志》,第67页,转自张霏芝《戴笠与抗战》,第323-325页;费云文:《中美合作抗日秘录》(一);梅乐斯:《另一种战争》上册,第65-120页。

② 关于这个临时办公地点的说明,参见梅乐斯《另一种战争》上册,第58页。

③ 中美合作所地址,台湾资料一般称作钟家山,美国称为快乐谷,中国大陆称作歌乐山。

④ 战略业务局过去通译为战略情报局,即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本文以下简称战略局。

⑤ 梅乐斯说自己的职务的名称是战略局“驻远东协调官”。任命签发时间是1942年9月22日,文件送达梅氏是10月12日。参见梅乐斯《另一种战争》上册,第141页。

⑥ 以上除另注外,均参见张霏芝:《戴笠与抗战》,第325-327页;费云文:《中美合作抗日秘录》(一)。

斯福分别批准^①，中美两国于 1943 年 4 月正式签署了^②《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协定正文共计 28 条，可反映该机构性质的主要条款有：

中美两国为摧毁共同敌人，求得军事上之胜利，特设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以完成此项任务。特由……双方代表……签定合作协定条文如左：

(一)为求在中国沿海沦陷地区及其他日敌各占领地区打击吾人共同敌人起见，特在中国组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其目的在以中国战区为根据地，用美国物资及技术，协同对远东各地之日本海军、日本商船、日本空军及其占领地区内之矿产、工厂、仓库以及其他军事设备，予以有效之打击……

(三)为便于业务之进行，美国愿以无代价供给一切物资，基于友谊而与中国合作，故在美国名为“友谊合作”，在中国之英文名称为 Sino-American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简称

① 该《协定》起草过程，参见鲍志超原作，潘嘉钊、侯俊华整理《从中英特务到中美特务合作》，潘嘉钊等编：《戴笠梅乐斯与中美合作所》，群众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3—36 页。

② 签署过程比较复杂。原计划由两国元首签署。但按照美国体制，总统签署的协定，要由国会参议院批准，不仅旷日持久，而且无法保密，遂改为由总统授权其下属签署。1943 年 4 月 1 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了签字仪式，中方签字者为在美国的外交部长宋子文和驻美大使馆副武官肖勃，美方由海军部长诺克斯、战略局长邓诺文和正好返美办事的梅乐斯签署，落款时间地点写为 4 月 15 日于华盛顿。戴笠的签名位置留下一处空白，他特选美国国庆纪念日 7 月 4 日在重庆补签。蒋介石于签字前的 1942 年 12 月 16 日批准该协定，罗斯福则于 1943 年 3 月底核准。参见梅乐斯《另一种战争》上册，第 183—185 页；费云文《中美合作抗日秘录》（一）。沈醉回忆说：该协定的签字仪式是 1943 年 4 月 15 日在重庆举行的。参见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沈醉、文强：《戴笠其人》，第 72 页。但沈醉并非出席签字仪式的当事人；而梅乐斯 4 月尚在美国，不可能出席重庆的签字仪式。该协定文本在大陆从未公布过，原文无标点，标点符号是笔者加的。

S. A. C. O., 此与美文 Socko 发音相同, 含有有效之猛攻或突击之意义。

(四) 本所之工作人员均须宣誓努力打击日本, 并对本所之组织与业务及其与本所有关之同盟国单位情形保守绝对之秘密。

(十五) 本所以重庆附近为主要训练地区, 遇有必要时, 经双方同意, 得于工作队所在地实施训练。

(十六) 本所各种训练人员, 除由美方派遣技术训练负责人及各种技术训练之设计指导人员外, 其他之教职员及学员均由华方选派之。训练课程及其进度, 由主任、副主任商订之。受训人员结业后之派遣, 经考试及实际测验及格后, 由主任、副主任决定分发之……

(二十七) 本协定经由中国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及美国罗斯福总统授权双方代表签字后施行。其有效期间, 自协定签订之日起, 至同盟国对日战争结束时停止……^①

值得注意的是, 协定签署人的排序是中方三人在前, 美方三人在后; 条款内容中很注意尊重中国主权, 保守中方机密; 组织上明确是在中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之下活动。很明显这是一个以打击日本为目的, 组织上以中方为主、以美方援助形式构建的跨国军事合作机构, 至少在协定字面上并无任何反共任务。

1943 年 7 月 1 日,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按英文名直译应为中美合作所, 简称中美所) 正式成立于重庆近郊磁器口歌乐山。^②

①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1943 年 4 月), 影印件。转自张需芝:《戴笠与抗战》, 第 329—340 页。

② 中美合作所地址, 台湾资料称作钟家山(参见张需芝《戴笠与抗战》, 第 341 页), 美国称为快活谷(参见梅乐斯《另一种战争》上册, 第 30 页), 本文按照大陆习惯称作歌乐山。

戴笠任主任,梅乐斯任副主任。另设总办公室,以主任秘书兼参谋长,佐理所务;潘其武任中方参谋长,贝乐利任美方参谋长。下设人事、情报、作战、气象、侦译、特警、通讯、会计、医务、总务共 10 个组;每组均设中、美双方各一人合计两名组长。各组组长为:人事组中方组长吴廷洛,美方组长告兹(James Googe)少校;情报组中方组长谢力公,美方组长詹姆士(Flegd James)少校;作战组中方组长余乐醒,美方组长李斯德(Lester G. Bruoj Geman)少校;气象组中方组长程浚,美方组长贝乐利(I. F. Boyerly)中校;侦译组中方组长倪耐冰,美方组长约克霍尔克(Jack S. Holtusick)中校;特警组中方组长乐干,美方组长庄士顿(Clerles S. Johnton)少校;通讯组中方组长程浚兼,美方组长劳尔(Rouel Rolinson)少校;会计组中方组长周浩良,美方组长不详;医务组中方组长张祖芬,美方组长泰勒(Goron Teylve)中校;总务组中方组长郭斌,美方组长鲍民(Gearge Bowman)中校。同年 12 月,美国战略局与美国海军在华情报业务一分为二:驻华海军专管气象、侦译、通讯、特警、海军情报、海岸监视等,驻华陆军则负责情报、爆破等;梅乐斯不再兼任美国战略局驻华主任,改由陆军中校卡福林担任。同时中美所增设研究分析、心理作战、秘密行动 3 个组。研究分析组中方组长陆遂初,美方组长温斯上尉;心理作战组中方组长吴利君,美方组长温姆斯(Wiemo)上尉;秘密行动组中方组长未详,美方组长道(Arden Dow)少校,并接受战略局驻华主任卡福林陆军中校指挥。随后又因援华物资渐多,来华美方工作人员增多,再增设供应、编译两个组。供应组中方组长侯祯祥、美方组长万尔菲尔;编译组组长刘镇方(该组无美方组长)。至此中美合作所下辖共计 15 个组。^①

① 张霁芝:《戴笠与抗战》,第 341-343 页。另据中方人员回忆,组名和组长有很多出入。

中美合作所成立之后,很快拟定《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工作计划纲要》,共计 34 条,详细规定中美所的工作步骤、范围、目标、方法等具体问题,经蒋介石批准实施。该《纲要》规定军统方面参加合作的力量有:“现有沿海之情报布置与各铁路破坏队,及军委会别动军与忠义救国军,及泰国挺进军。”所有接受中美所训练和装备,由中美联合指挥,派遣敌后开展游击战的,称作“特种作战部队”。具体任务是:“在敌人占领地区,布置情报工作,搜集敌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各种情报”;“在敌占领区内重要城市、铁路、公路、河流、矿产,及中国与安南、泰国沿海各军商港湾、岛屿,利用各种力量与方法,对敌予以不断之打击”。“按目前军事上之需要,侧重平汉、津浦与京沪杭铁路沿线,及武汉与中南半岛,以及中国南海各地工作之策进,将来并随战况之推移,将工作重心,渐次向北推进。”为此计划“加强别动军及忠义救国军与泰国挺进队及军统局各铁道破坏队,从事敌后之扰乱、突击,及破坏敌军机场、交通、资源、矿产、工厂、仓库,并策动工人罢工,以减少其生产”。^①

这些“特种作战部队”,计有别动军 7 个纵队、忠义救国军 4 个纵队、各铁路破坏队、水上破坏队等。经训练后,改编为别动军 8 个纵队(开始是 6 个纵队。而且首先编成的仅第一至第四纵队;第五、第六纵队稍后编成;第七、第十纵队 1945 年才编成)、忠救军 3 个纵队,湘鄂赣边区行动总队(梅乐斯称之为长江突击队)、铁道破坏队、水上破坏队若干;“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各班训练后编组的各教导营(多半由受训学生编成)等,共约 5 万人。^②

①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工作计划纲要》,转自张需芝《戴笠与抗战》,第 344-348 页。

② 张需芝:《戴笠与抗战》,第 390 页。

三 游击干部的培训

中美合作所成立后,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除了气象、水文、侦听、情报、策反、敌后宣传等情报工作外,还有一个重要工作就是为中国训练、装备了数万敌后游击部队。本文因篇幅所限,主要描述中美合作所培训游击干部方面的工作情形。^①

根据《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的规定,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在全国各地设立多个“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简称中美班),训练和装备军统局指挥的别动军、忠义救国军、铁路破坏队等敌后游击部队,“以增强其战斗能力,打击日军”。^②

中美班的训练,以拟装备的美国新式武器为培训依据,融汇了美国较为先进的战术、技术及战术思想。美方在各班设总教官 1 人,教官数人或十余人、数十人不等,负责军事课程的教学和训练。其教授的课程,以新的军事技术为主,约占 75%,由美国教官讲授。军事科目有 17 门,分别为:1、飞机识别;2、伪装及掩护;3、地图判读法;4、战地急救法;5、观测;6、射击目标之指示;7、搜索;8、侦查;9、埋伏;10、袭击;11、巷战;12、夜间步哨、勤务;13、夜间演习;14、野外演习;15、手榴弹;16、手枪;17、汤姆生冲锋枪。技术科

① 关于中美所的各训练班,目前中国大陆尚未发表过全面、系统、详细的研究论文和介绍文章。单篇文章仅有介绍第三和第四训练班的两篇文章(详见下文注释文强和陈贵敏文章)。另原军统和中美合作所中方人员在新中国服刑期间曾有一些交代材料,对各训练班情况有所介绍,但对游击干部的介绍均较粗糙,且与台湾材料有出入。可参见潘嘉钊等编《戴笠梅乐斯与中美合作所》中的几篇文章。还有内刊《口述历史》曾发表原军统成员黄康永的长篇口述文章(分 10 期连载),对军统包括中美合作所的各种训练班均有介绍,但差错较多。

② 张需芝:《戴笠与抗战》,第 373 页。

目有 5 门, 分别为: 1、擒拿术; 2、联络及秘密通报; 3、破坏; 4、情报; 5、爆破。其他军事基本学识、政治教育课程等, 约占 25%, 由中国教官讲授。课程有: (一) 军事科目: 1 学科: 步兵操典、基本战术; 2、术科: 基本教练、射击教练、战斗教练、阵中勤务; (二) 技术科目: 1、学科: 情报业务、城市暴动、行动技术; 2、术科: 夜间演习、行动演习; (三) 政治科目: 1、学科: 国父遗教、领袖言行、精神讲话、特约讲话; 2、政训: 小组讨论、各项竞赛、各种集合; (四) 其他演习: 1、防空演习; 2、行军演习; 3、紧急集合演习等。训练期限, 为争取时间, 采取速成方式, 最少两个月, 最多四个月, 一般 3 个月左右。

受训学员, 开始由各相关游击部队保送现役官兵受训, 结业后回原部队继续任职。后为集中力量, 改为由各游击部队, 按战斗序列, 整营整连成建制入班受训; 原长官随同入班, 仍任原职; 结业时装备新式美国武器^①, 派往指定的敌后区域或仍回原地, 执行游击任务。训练地点, 原计划在忠义救国军、别动军、铁路破坏队的驻地附近, 寻觅适当地点, 设班施训。后因战局变化, 有所变动; 还有应美国要求增设的。实际设班开训的, 计有: 安徽雄村、湖南南岳(后迁湘西和贵州)、河南临汝(后迁陕西)、绥远陕坝、广西南宁、福建华安、福建东峰、浙江玉壶(初在浙江青田)、贵州息烽、安徽临泉、广东梅县等地, 共计 11 个训练班。^② 因为军统自己主办的各种训练班均由戴笠兼班主任, 所以这些中美班也仅设副主任, 负实际责任。

① 按照每 10 人配备 4 支汤姆生冲锋枪、4 支卡宾枪、2 支左轮手枪的比例装备; 另每人 2 枚手榴弹, 其他火箭炮、燃烧弹、爆破器材等, 则视需要配备。张霏芝:《戴笠与抗战》, 第 373 页。另据中美所美方副主任梅乐斯回忆: 开始武器供应比较充足, 各班毕业时举行授枪仪式; 后来武器供应发生困难, 配备不足。参见梅乐斯《另一种战争》中册, 台湾新生报译本, 1981 年第 3 版, 第 340 页。

② 参见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编印《中美合作所志》, 第 134 页。转自张霏芝《戴笠与抗战》, 第 373—375 页。

开办最早的是安徽歙县雄村第一班。1943 年 3 月在《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正式签署前即设班, 第一期调集散布于苏、浙、太湖一带的忠义救国军干部 300 人施训。副主任郭履洲, 美方总教官马斯德 (J. H. Masters) 少校 (后巴尔金 (Charles M. Parkin) 少校)。1943 年 6 月开训, 至 1945 年 2 月, 该班共举办 7 期, 合计训练忠义救国军各部、别动军第七纵队、军统局皖南行动队、军统局福建调查室行动队等单位共计 15885 人。结业后主要部署于皖南青弋江一带, “以截断长江, 控制芜湖水库, 及截断京芜铁路, 进击南京, 并由徽州、绩溪、临安, 经徽杭国道, 进击杭州, 同时负责监视孝丰、湖州、苏州一带之日军活动等任务”。^① 第八、九期改由娄剑如任副主任, 调训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阮清源部官兵。1945 年 7 月, 戴笠策划再训练上海工人福利委员会陆京士手下上海工人 1200 人, 因日军投降而中止。^②

第二班设在湖南南岳。1943 年 6 月设班, 第一期 8 月开训, 至 1944 年底, 共办 4 期。先后训练别动军第一、二、四纵队各大队, 第五纵队第一大队, 军统局粤汉铁道破坏队, 军统局湘桂、浙赣、鄂南等处行动队等部共 2400 余人。副主任陶一珊, 美方总教官初为史蒂华 (Merrill R. Stewart)^③, 后为班乃特 (Joe Benett)。前三期办班地点都在南岳衡山的大庙里, 共训练学员 2217 人。^④

① 参见张霁芝《戴笠与抗战》, 第 377 页。

② 乔家才:《中美班训练游击队》, 乔家才:《浩然集(一): 铁血精忠传》, 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 1981 年初版(以下简称《铁血精忠传》), 第 410 页。

③ 此据梅乐斯《另一种战争》中册, 第 341 页。张霁芝书未提此人。

④ 张霁芝:《戴笠与抗战》, 第 377 页; 乔家才:《中美合作所功不可没》(上), 台北《中外杂志》1983 年第 36 卷第 6 期。另据梅乐斯说: 第二班第二期毕业学员 670 名, 第三期受训学员 1500 名(参见梅乐斯《另一种战争》中册, 第 337-338 页)。仅这两期就达 2170 名, 加上第一期, 则前三期似应不止 2200 余名。

1944年6月第三期结业后,美国教官钱普(Joe E. Champe)上尉和中国教官林葆格,由印度学习磁性水雷技术回班,抽调别动军第一、二纵队已毕业学员102人,转往江西梁塘另施水上破坏训练。^①1944年8月,南岳班第四期开学,受训学员200余人。^②因受长衡会战长沙、衡阳先后失守的影响,该期由教育长徐秋滨率领,迁往洪江;后又再迁贵州镇远。杜普拉斯(E. P. Dupras)少校于10月接替班乃特上尉担任总教官,但基本停训,主要开展敌后游击战。陶一珊、班乃特等则从洪江转赴南宁,另行筹办第五班。^③

第三班初设河南临汝风穴寺。1944年豫中会战后,第二期迁往卢氏,再迁镇平;第三期西迁至陕西商县;第四、五期进一步西迁至西安附近的牛东。该班1943年8月设立,11月第一期开训,至1945年日本投降,共办5期。先后调训别动军第五、六纵队,平汉、陇海、津浦、同蒲各线铁道破坏队,以及鄂北、豫、皖、鲁、冀、晋各省的行动队,还有在敌后招收的青年学生等,共计3025人。副主任前三期为文强,后两期改为杨蔚;美方总教官第一期是道威陆军少校,第二、三期是杨格(L. T. Young)海军少校,第四、五期是海军陆战队的克莱默(Vincent R. Kramer)少校。学员受训后一般回原部队继续坚持游击作战。1945年8月日本投降,正在受训的第

① 详见下文行动破坏训练之第二行动区。

② 此据张需芝《戴笠与抗战》,第378页。其中别动军第一、二纵队46人,编为沅江水上游破坏队;鄂南工作队141人,编为别动军第二纵队第一大队;还有干部训练队数十人,合计200余人。另据梅乐斯回忆,撤往洪江的第二班第四期学员有1500人。参见梅乐斯《另一种战争》中册,第360页。则第二班4期一共培训学员不止2400余人,至少在3700人以上。

③ 本段除另注外,参见张需芝《戴笠与抗战》,第377-378页;乔家才《铁血精忠传》,第410页;乔家才:《中美合作所功不可没》(上);梅乐斯《另一种战争》中册,第374、575页。

五期学员,被编为华北先遣队,进驻徐州。^①

第四班设在绥远陕坝大顺成。1944 年春成立。^② 原计划“分期调训晋、冀、绥各地行动队及平绥铁路破坏队,以建立西北游击基地”。后因交通等不便,改为调训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所部出击队官兵、税警骑兵团挺进队、军统局五原办事处、察哈尔各单位人员以及选考的学生,共办 4 期^③,训练学员 900 余人。前两期高荣任副主任,后两期乔家才为副主任;美国郝拉德上尉为总教官。前两期结业后,由美国教官海军上尉威尔森和海军陆战队上尉雷诺(LT. Renould)带领,编组为别动军一个纵队,赴平绥线以北的大青山,重点破坏平绥铁路^④,成为北方游击战的重要力量之一。^⑤

第五班实际是第二班的后续班。原拟设在云南普洱,由美方协助训练泰国工作队员。后因故延误,遂因桂柳会战的需要,改为

① 张霁芝:《戴笠与抗战》,第 378—379 页;乔家才:《铁血精忠传》,第 411 页;乔家才:《中美合作所功不可没》(上);文强:《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第三班始末》,河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河南文史资料》第 30 辑,郑州,1989 年 5 月印刷,第 95—107 页;梅乐斯:《另一种战争》中册,第 631—636、648—650 页。

② 另一说 1944 年 1 月即成立,显然比“春”早。参见陈贵敏《高荣与陕坝中美合作所》,《档案与史学》(内蒙古),2005 年第 3 期。

③ 此据乔家才:《中美合作所功不可没》(上)。另据同上陈贵敏文章,该班共办 5 期。调训人员为:第一期调训绥远青年学生 60 人;第二、三期调训绥远民众自卫军选送的 270 人;第四期调训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处选送的 280 人;第五期调训缉私署宁夏税警团选送的 300 人。5 期说似乎资料更详细、具体;但第二、三期未作区分。培训人数两说相同,均为 900 余人。

④ 另据陈贵敏文章,第二期学员毕业后编为平绥铁路破坏纵队,第三四期学员毕业后编为别动队绥远第一支队,由高荣担任支队司令(应为支队长),开赴大青山抗日前线。出处同上陈贵敏文。

⑤ 本段除另注外,均参见张霁芝《戴笠与抗战》,第 379—380 页;乔家才《铁血精忠传》,第 411 页;费云文《戴笠的几个战场》(四),台北《中外杂志》,1984 年第 36 卷第 6 期。

训练由中越边境北调桂南作战的别动军第三纵队,训练班设在广西南宁。由原第二班副主任陶一珊任第五班代主任,第三纵队司令徐光英为副主任,原第二班班乃特中尉为总教官。^①招收广西青年学生 900 余人,编为别动军第三纵队第三支队。1944 年 9 月 10 日开训,因桂柳战事吃紧而于 10 月 1 日提前结业;装备美式武器后,分别进入沦陷的玉林、梧州、南宁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②

第六、七、八、十三等 4 个班是应美方要求增办的。1944 年 5 月,梅乐斯奉美国联合参谋本部命令,要求在中国东南沿海加强部署,预作策应美国海军登陆的准备。为配合这一行动计划,中美合作所特在中国东南沿海设立上述 4 个训练班,调训海上游击队和广东一带未经训练的别动军第一、二纵队部分部队,另招收青年学生参加,以加强大陆沿海和各岛屿之布置。

第六班设在闽南漳州华安。由军统闽南站站长陈达元任副主任,雷镇钟任第二副主任;美方哈伯林少校任总教官。1944 年 9 月开训,共办 3 期;培训军统局驻闽南各单位工作人员、闽南青年学生 2000 余人^③,结业后编为教导第一至第四共 4 个教导营,布防在闽南漳州、泉州、海澄等沿海地区,加强防务,监视日军活动。

第七班设在闽北建瓯东峰。行政上与军统局东南特别训练班合并,由军统东南特训班副主任林超兼任第七班副主任,美国海军上尉史华兹(Hairy. D. Swartz)任总教官,美国教官多达 60 余人。共办 2 期。主要是秘密调训闽江口外南竿塘岛(即马祖岛)已经反正的伪军张逸舟部;其他训练对象为就地考试选拔的福建青年学

① 梅乐斯:《另一种战争》中册,第 591 页。

② 张霁芝:《戴笠与抗战》,第 380 页;乔家才:《中美合作所功不可没》(上)。

③ 此据张霁芝书第 381 页。另据乔家才说:第六班仅办两期,训练 1637 人;参见乔家才《中美合作所功不可没》(上)。

生和军统局浙、闽、赣、皖各站保送的工作人员, 共计 1401 人。还补充训练东南班第一期毕业生 105 人, 合计 1506 人。^① 结业后, 编为第五至第七共 3 个教导营, 换发美国新式武器, 仍回原部; 张逸舟部伪军则继续潜伏待命。

第八班设于浙江瑞安玉壶(初在浙江青田)。赵世瑞任副主任, 娄剑如任教育长(后娄剑如和第一班郭履洲对调, 郭任第八班副主任, 娄任第一班副主任); 美国史文素少校任总教官。1944 年 8 月开训, 共办 4 期; 主要调训忠义救国军浦东特种行动队张为邦部 1800 余人, 结业后编为第九至十一教导营和特务营(前三期各编 1 个教导营, 第四期编为特务营), 接受忠义救国军温台地区指挥部的指挥。

第十三班实际是第五班的后续班, 设于广东梅县。1945 年 2 月开训, 共办 1 期, 调训位于广东的别动军第一纵队部分官兵和粤汉铁路南段破坏队人员共计 1207 人, 结业后编为 2 个教导营, 在广东敌后担任突击和破坏任务。^② 副主任汤毅生。^③

第十班设在贵州息烽。利用原军统息烽特训班的地址和机构, 先后派邓匡元、何峨芳为副主任; 美方初以约旦中尉^④、后改以石格(Wliam H. Sager)上尉为总教官, 另有美国教官 13 人。1944 年 10 月设立, 1945 年 2 月开训, 共办班 2 期; 受训对象为汤恩伯兵团招考的青年学生 2071 人; 结业后编为 4 个教导营, 担任敌后

① 张霁芝书第 381 页说: 第七班共办 2 期, 培训 1401 人; 乔家才同上文说: 第七班共办 3 期, 培训 1506 人。

② 以上 4 个班情况, 除另注外, 均参见张霁芝:《戴笠与抗战》, 第 381- 383 页; 乔家才:《铁血精忠传》, 第 412- 413 页; 乔家才:《中美合作所功不可没》(上)。

③ 郑锡麟原作, 潘嘉钊、钟敏整理:《中美合作所的各种训练班》,《戴笠梅乐斯与中美合作所》, 第 93 页。

④ 此据梅乐斯《另一种战争》中册, 第 594- 595 页。张霁芝书未提及约旦中尉。

突击和破坏工作。^①

第十一班设在安徽临泉。此处原有军统训练班,专门调训鲁苏战区游击队和津浦、胶济铁路破坏队。自从1943年10月中美第三班在临汝成立后,临泉班在技术设施和装备技术等方面,多有受益,实际上成为中美第三班的分部。1944年春豫中会役后,第三班逐渐西迁;中美所遂于1945年7月,将军统临泉班改为中美第十一班,派周麟祥为副主任,刘紫剑为教育长,加强训练和装备。第一期训练925人,尚未毕业,日本已投降。刘紫剑率领学员前往徐州,编为2个教导营,并入交警第一总队,开赴山东胶济铁路。^②

此外还有第九班,即设在重庆的特警班,任务是训练刑事警察,一般不计算在游击训练班序列之内。^③

中美合作所除了训练游击队之外,还有气象、情报、行动破坏、电讯、医务、保管技术、外语、特警等方面的合作培训;均利用美国的技术和器材,培训中国的相关人才,为敌后游击战和中美联合作战服务。此外还有侦译、研究分析等与工作相结合的培训方式。办培训班的类型主要有以下8种:

1. 气象培训。1943年2月起,美国海军在重庆举办“气象人员训练班”,调训军统系统报务人员151人,分4期受训;结业后分派各战区包括敌后战区各重要地点,设立气象站、测候站近百个,为盟军提供气象情报。

2. 情报培训。1943年12月,在重庆设立“中美情报训练班”,1944年1月正式开训,至1944年10月,共办4期,每期一至二个

① 《中美合作所志》,第143页,转自张霁芝《戴笠与抗战》,第383页;另参见乔家才《铁血精忠传》,第413-414页。

② 张霁芝:《戴笠与抗战》,第383-384页;乔家才:《中美合作所功不可没》(上),。

③ 乔家才:《中美合作所功不可没》(上)。

月,共调训军统局敌后工作人员138人,结业后由美方人员带领,潜往敌占区,设立前进联络站、前进指挥站、潜伏分站和情报组,建立起东南沦陷地区的情报网和监视站。

3. 行动破坏培训。(1)在湖南衡桂柳设立第一行动区。1944年7月至12月,先后在桂林、柳州、贵阳举办3期“行动爆破训练班”,先后调训粤汉铁路破坏队、别动军第三纵队、军统柳邕行动组人员共计39人,由美方施以爆破铁路、桥梁,袭击仓库等秘密行动特技训练;结业后配发新器材,分别组建广东广(州)三(水)铁路行动组和广西柳邕行动组,深入敌后执行破坏行动。(2)在江西修水设立湘鄂赣第二行动区总部。1944年9月至1945年初,在江西漫江梁塘,共举办4期训练班(有人将该班称作前述中美班第二班的延续^①);戴笠兼班主任,唐新为副主任;培训就地招考的知识青年1100人。另办干部培训班1期250人;合计5期共培训1300余人。由美国教官钱普等6人负责施训。结业后与中美合作所调拨的500人,混合编为湘鄂赣行动区行动总队(梅乐斯称作长江突击队,唐新任总队长),辖3个支队12个大队,负责长江以南洞庭湖和鄱阳湖之间85县范围的敌后爆破等破坏行动(此外还有中美联合作战的第三、第四行动区,但未办培训班,故略)。

4. 电讯培训。(1)1944年在重庆,曾开办“通讯人员短期训练班”,戴笠兼班主任,军统局第四处(电讯处)处长魏大铭兼副主任,调训军统局电讯人员训练班学员20人,由美国电讯教官施训2个月,教授新式通讯方法等,结业后分发各地,配合美方,筹建各地电台。(2)1944年7月,美方教官从军统局东南特训班电讯系选调20人,带往福建东峰,举办电讯人员训练班,就地施训3个月,结业后分发沿海各地,参与筹建各情报站和了望所。(3)1944年9

① 参见乔家才《铁血精忠传》,第410页。

月,在重庆再设立电讯训练班,调训军令部电讯总所人员 30 名,由美方训练,结业后配合美国陆军筹建中美所陆军总台,并加强华北各地的电台通讯工作。3 个班共培训 70 人。至 1945 年,中美合作所在中国各地建立起严密周全的电台通讯网络:在重庆设有中美合作的陆军、海军总台各 1 座;在浙江、江西、福建、上海、湖南、陕西、甘肃、广东等地建有设备完善的电讯支台 10 个;在全国各战区、尤其是东南沿海敌后地区,包括海外地区,建立了数十个分台。各台均有受训学员参与工作。

5. 医务培训。1943 年 12 月,戴笠商借军政部湖南“东安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第五分所的设备、教官,成立中美合作“东安医务所训练班”,陶一珊兼任副主任,由美方教官和医师负责技术培训。从 1943 年 12 月至 1944 年 8 月初,共办两期(第二期因长衡会战,中途西迁贵州独山),调训别动军、忠义救国军原有医务人员,并考选军统局息烽特训班和东南特训班部分有医务常识的学员共计 100 余人。结业后选拔其中 51 人,加上美方医务人员 23 人,在东安成立有 100 个床位的医疗中心,作为忠义救国军的野战医院;另编组 2 个卫生队,分赴忠义救国军工作。别动军各纵队,则配有中美两国的医务人员。

6. 保管人员培训。为保管从美国运来的新式武器、弹药、器材、仪器,1943 年 2 月至 4 月下旬,举办“保管人员训练班”1 期,选调军统局贵州息烽特别训练班毕业学生 41 人受训,学习各种机械常识和保管方法,结业后分发各仓库工作。

7. 外语人才培训。为配合中美所的工作,1943 年 9 月至 1945 年初,在重庆举办“外语人员训练班”4 期,每期从西南各大城市考选专科以上毕业(后降为高中以上)、有英语专长的学员数十人,结业后分发中美所各单位工作。该班 4 期共培训英语人才

188 人。^①

8. 特种技术培训。由梅乐斯主持,陶一珊为副主任,在重庆举办特种技术训练班。1942 年 10 月开训,1943 年 1 月结业,仅办 1 期,培训 25 人,结业后分发敌后担任破坏工作。^②

中、美合作,先后对中国游击部队及相关专业人员共约 5 万人进行了培训。这样大规模对敌后游击部队施行先进技术、先进武器及先进战术思想的训练,提升了中国游击培训的水平和档次,提高了游击部队的敌后作战能力。接受过中美合作所训练的敌后游击部队,后来不少曾有重要的游击战绩。

四 中美联合游击队的敌后抗日活动

中美班的学员毕业后,或被编成教导营,或保留入营受训时的忠救军、别动军原建制,教官一部或者全部参与其中担任顾问,组成中美联合游击队,直接开展对日敌后游击战。他们在陆地上主要采取两种游击作战手段:一是组成行动队或行动小组,破坏日军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设施并搜集情报;二是以游击队主力突击

① 以上除另注外,均参见《中美合作所志》第 37、70、81 页,《国防部情报局史》,台北“国防部”情报局编印,1962 年 3 月版,第 112、172 页等,转自张霁芝《戴笠与抗战》,第 350—366 页。本段外语培训还参见张霁芝书第 309 页。另据郑锡麟回忆说:该外语班共办 4 期,前三期每期 100 人左右,第四期 100 人,参见郑锡麟原作,潘嘉钊、钟敏整理《中美合作所的各种训练班》,潘嘉钊等编:《戴笠梅乐斯与中美合作所》,第 84—85 页。则 4 期合计约培训约 400 人。

② 《中美合作所志》,第 59 页。转自张霁芝《戴笠与抗战》,第 310 页。该班即电视连续剧《一双绣花鞋》中一再渲染的特种技术训练班。其实当时是训练深入沦陷区从事敌后情报和破坏工作的游击干部。

或袭击日军的据点,打击日军或牵制其兵力。^①在水路方面,主要是在华中长江水道和洞庭湖一带布雷,阻挠日军的水上运输。他们在敌后不断对交通设施、军事设施,以及工厂、矿山等,进行破坏;对日军官兵及汉奸,进行制裁;并配合正规军作战;使日军的行动和补给均遭受重大损失。

据统计,该特种部队自1943年中美合作所成立至1945年日本投降,以第一种行动破坏手段,共击毙日军军官104名、士兵6184名,炸毁工厂、矿山、桥梁、铁路、船舶、飞机等甚多;以第二种游击作战方式,共计歼灭日军19000余人;两者合计2.6万余人。^②这2.6万主要是击毙人数。据中美合作所美方参谋长贝乐利1946年说:中美合作所部队:“击毙敌寇26799人,伤11642人,俘虏508人,破坏桥梁183座,舢板158只、汽船35只,飞机1架,车头、车厢425节,库房271个,铁路303段,机动机车269辆,营救联合国飞行员130名。”^③按梅乐斯的说法:经中美合作所训练后“发出的每一只枪支,平均已打死一个半敌人”,是全世界各反法西斯战场上,“投入与产出比”最高的单位之一。^④

中美合作所敌后游击战中比较突出的战例,属于第一种行动破坏作战形式的有:

1. 破坏焦作煤矿。1944年1月12日夜,经中美所第三班训练后的平汉铁路破坏队,执行由第三班中美双方和正在第三班受

① 参见《军事委员会别动军作战指导计划》(1944年6月),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787-11953,第21页。

② 张霁芝:《戴笠与抗战》,第393页。

③ 杨雁冰:《公祭戴笠中将·贝乐利谈戴笠将军》(1946年6月12日),《申报》1946年6月18日第7版。

④ 梅勒斯1945年8月22日在重庆召开的美国记者招待会上语。转自张霁芝:《戴笠与抗战》,第410页。

训的别动军第五纵队三方负责人共同研究、周密制定的破坏计划,在别动军第五纵队出动6个突击队的掩护下,以及第一战区挺进第十三纵队4个大队的配合下,铁路破坏队出动6个行动组,冒着风雪,破坏了河南焦作煤矿。首先攻占焦作煤矿第39号矿的井场,然后炸毁发电机3部、锅炉6个、抽水机8部、电高车、汽高车、压风机各1部,拆卸、缴获器材一批;另炸毁铁桥2座、水泥桥1座,汽车4辆,碉堡1座,铁轨8根;使该第39号矿生产停顿,焦作市内部分建筑物受损,焦作东至李河车站。西至常叙车站之交通设置均被破坏,交通受阻;还毙伤伪矿警守备部队200余人。^①

2. 破坏黄河大桥。1944年1月21日夜,经中美所第三班训练后的平汉铁路破坏队在别动军300余人的掩护下,冲破日军严密防守,强行破坏郑州以北的黄河铁路大桥,炸毁该大桥桥身梁柱50余根(该大桥全长2000余米,桥身共计119根梁柱),使平汉铁路中断达两个月之久(该大桥3月25日才修复通车),推迟了豫中会战的爆发。^②

3. 炸断蒲圻铁桥。1944年5月8日凌晨,中美所第二班训练后编组的中美联合水上爆破小组(由中美双方各6人组成),继在武昌至金口长江江面上炸毁日军500吨级炮舰一艘后,又破坏粤汉铁路蒲圻铁桥,共炸毁桥墩两座,炸飞路轨,震塌桥面,并炸毙炸伤守桥日伪军数十人,推迟了长衡会战的爆发。^③

① 张需芝:《戴笠与抗战》,第394—395页;《豫北我军破坏焦作煤矿》,《中央日报》1944年1月24日第2版;文强:《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第三班始末》,《河南文史资料》第30辑。

② 参见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编:《中美合作所志》,第55、158、160、165页,转自张需芝《戴笠与抗战》,第395页;费云文:《戴笠的几个战场》(四)。文强同上回忆文章所说的中美所第三班美方人员全体出动,参与破坏黄河汴新铁路大桥,应指此事。

③ 张需芝:《戴笠与抗战》,第396页;费云文:《戴笠的几个战场》(四)。

4. 连续破坏浙赣线。1944年9至10月,经中美所第一班训练后的忠救军第三纵队组织300人的突袭队,有美军5人参加,先后破坏浙赣线诸暨附近铁路25处,哨所2个,铁桥2座。11月又组织名为“劫煞组”的破坏队,仍有上述美军5人参加,焚毁同上地点日军仓库,毁汽油、煤油10万余加仑和弹药600箱。嗣后,美国教官赫尔挑选新反正的伪军约130名组成破坏队,使用延时爆炸的新型爆破器材,在诸暨和义乌之间的安华炸毁浙赣线火车和铁轨;继而在开化焚毁了5座日军仓库。^①

5. 炸断钱塘江大桥。1945年2月4日凌晨,经中美所第一班训练后的忠义救国军第二纵队余万选派第六团副团长周荣亲率爆破组员应雄、陈御芳、王显盛等,冒着漫天大雪,将日伪严密防守的钱塘江大桥第6、7号桥墩炸毁,破坏了日军连接浙西、浙东的交通要道。^②

6. 炸断浦阳江铁桥。1945年5月6日凌晨,经中美所第一班训练后的忠义救国军浙东特种爆破组,炸毁浙赣线第二大桥浦阳江铁桥,炸毁第三、四号桥墩,炸斜第五、六号桥墩,桥面铁轨严重损坏,使浙赣铁路继钱塘江大桥被炸之后,再次中断。^③

7. 破坏永嘉县城和丽岙大桥。1945年5月,中美所第八班第一期毕业后编组的第九教导营,派遣由8人组成的爆破组,潜入已沦陷的浙南永嘉县城,在成功炸毁日军驻永嘉县城总部、伪县政府、伪警察局等之后,又于5月20日在瑞安县境内炸断从永嘉通往瑞安的丽岙公路大桥。^④

① [美]梅乐斯:《另一种战争》中册,第618-625页;费云文:《戴笠的几个战场》(四)。

② 《军事委员会别动军各部队1945年2月战果统计汇报表》,二史馆藏,战史会档案787-11967,第50-51页;费云文:《戴笠的几个战场》(四)。

③ 张霁芝:《戴笠与抗战》,第402-403页。

④ 张霁芝:《戴笠与抗战》,第403-404页。

8. 破坏宝城煤矿。1945 年 6 月 6 日, 忠义救国军南京行动总队会同中美合作建立的第三行动区, 派出行动人员 30 人, 化装成工人, 混入苏南宝城煤矿, 秘密安装定时炸弹, 当晚 9 时引爆, 炸毁该煤矿第一、第二两个矿井和开矿机、发电机, 使该煤矿停产。^①

属于第二种游击作战形式的突出战例有:

1. 保卫大青山根据地。1944 年 5 月 14 日, 以中美第四班毕业学员为骨干编组的别动队绥远独立支队, 在萨拉齐以北 15 里的北什图抗击日军以坦克、装甲车各 7 辆为先导、配备重炮数门的 600 余人的疯狂进攻。经 3 小时激战, 击毁日军坦克 2 辆、装甲车 4 辆, 击毙日军 70 余人, 重创日军, 粉碎其扫荡, 保卫了大青山根据地, 别动队也因此声名大振。^②

2. 长衡会战游击战。1944 年 5 月下旬至 8 月上旬, 长衡会战的长沙保卫战期间, 经中美所第二班训练后编组的湘鄂赣边区行动总队, 在岳阳通往长沙的公路上埋设用玻璃罐和瓷罐装填碎玻璃和炸药制成的杀伤力强大的“土地雷”, 在长沙附近埋设地雷; 当日军进攻长沙时, 给予较大杀伤, 毙伤敌 1000 余人。又在长沙附近湘江水道, 用水雷、炸药、手榴弹等, 布设一个可移动的水雷区; 使日军舰艇和运输船舶遭到损失。衡阳保卫战期间, 经中美所第二班训练的别动军第二纵队组织 300 人的敢死队, 于 6 月下旬攻占株洲, 并坚守几天, 一度切断日军长衡间运输。别动军第二纵队在长衡会战期间配合正规军游击作战共 153 次, 毙伤日军共 1947 人; 经中美所第二班训练的别动军第四纵队在长沙沦陷后奉命挺进敌后, 袭击日军补给线, 会战期间游击作战共 34 次, 毙伤日军

① 张霁芝:《戴笠与抗战》, 第 404 页。

② 张霁芝:《戴笠与抗战》, 第 403 页; 陈贵敏:《高荣与陕坝中美合作所》,《档案与社会》, 2005 年第 3 期。

1100 余人。^① 合计中美所训练装备指挥的游击部队, 在长衡会战三个月中, 毙伤日军 4000 余人。

3. 桂柳会战游击战。1944 年 8 月中旬至 11 月下旬, 桂柳会战中, 经中美所第五班训练的别动军第三纵队在广西南宁附近和桂东南敌后地区, 牵制日军, 游击作战百余次, 战绩颇丰。1945 年 1 月, 又在广西梧州附近 7 次袭击日军, 毙伤日军 306 人。^②

4. 粤汉铁路游击战。经中美所第二班训练的别动军第一纵队, 为了牵制驻广东敌军, 策应桂柳会战, 在 1944 年下半年, 曾袭击广州附近日伪军 51 次, 累计歼敌 1500 余人。1945 年初, 改为集中破坏粤汉铁路南段。1 月份出击 17 次, 炸毁火车机车 3 辆、车厢 13 列, 破坏铁轨 500 余米, 俘获日军电台 1 座, 摧毁敌军事电讯学校 1 所。2 月出击 32 次, 广泛袭击日军各军事和交通据点, 俘日伪军 156 人, 炸沉汽艇 7 艘, 毁飞机 1 架, 炸毁桥梁 7 座、火车头 2 辆和汽车多辆。经中美所第二班训练的别动军第二纵队, 重点袭击粤汉铁路北段长沙至衡阳段, 1945 年 1 月先后出击 30 次, 毙伤敌约 800 人, 其中包括击毙一名日军将级军官。^③

5. 闽浙游击战。在 1945 年 4 月开始的闽浙沿海反击战中, 首先于 4 月 16 日, 由中美所第七班副主任林超率领专门组织的“莆田作战队”, 实施两栖突击作战, 登陆闽中沿海乌 岛, 毙俘守岛日军 22 人, 捣毁岛上灯塔, 缴获电台、武器多件。其次于 5 月上旬, 林超与美军总教官史华兹(Swartz) 海军上尉率领别动军两个大队及美军 80 余人参加收复福州的战斗, 于 11 日攻占福州机场,

① 张霁芝:《戴笠与抗战》, 第 398- 400 页; 费云文:《戴笠的几个战场》(四); 梅乐斯:《另一种战争》中册, 第 373、588- 589 页。

② 张霁芝:《戴笠与抗战》, 第 400 页; 费云文:《戴笠的几个战场》(四)。

③ 费云文:《戴笠的几个战场》(四); 梅乐斯:《另一种战争》中册, 第 592 页。

帮助陆军第八十师于 18 日收复福州。6 月, 忠义救国军温台指挥部指挥官郭履洲, 指挥中美合作所第八班训练装备编成的教导第九、十、十一共 3 个教导营, 分兵三路, 于 6 月 18 日攻克温州; 然后在柳市附近追上从温州撤出的日军, 仅教导营就缴获日本军用物资多达二三百吨。此外, 7 月上旬, 驻闽南厦门、金门的日军 3000 余人, 拟由陆路撤往粤东汕头时; 中美所第六班训练装备的 4 个教导营为主力, 在第六班副主任陈达元、雷镇钟和美方总教官哈伯林的指挥下, 在闽南沿途截击; 在中美空军的配合下, 使该股日军损失过半, 平均每天仅前进 11 华里, 狼狈逃到汕头; 中美教导营损失也重, 参战美军亦有负伤者。^①

6. 桂柳反攻战。1945 年 4 月下旬至 8 月初, 中国军队在广西发动了反击战。别动军兵分三路, 分别配合第二、三、四方面军进攻南宁、柳州和桂林。别动军第三纵队首先引导和配合第二方面军, 于 4 月 27 日占都安, 5 月 27 日克南宁; 然后配合第三方面军反攻柳州。当第三方面军在宜山和日军形成拉锯战时, 由中美合作所班第二训练班和第十训练班新编成的别动军第七和第十纵队, 从贵州赶赴广西增援别动军第三纵队; 侧击日军, 破坏敌后交通, 一周之内, 袭击日军 12 次, 毙敌 292 人; 协助第三方面军于 6 月 14 日收复宜山。然后别动军第三、七、十纵队一起配合第三和第二方面军会攻柳州。在广东活动的别动军第一纵队也派出一支突击支队, 赶至桂林、柳州之间, 发动突击, 破坏日军交通工具火车和汽车。柳州日军内外交困, 被迫于 6 月 29 日撤往桂林。中国军队 30 日收复柳州时, 别动军第三纵队最先入城。南宁、柳州收复

① 《抗日战史·南战场追击》, 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 1982 年 10 月再版, 第 9 - 10 页; 张需芝:《戴笠与抗战》, 第 406 - 407 页; 费云文:《戴笠的几个战场》(五), 台北《中外杂志》1985 年第 37 卷第 1 期。

后,以第三方面军为主,第四方面军配合,重兵围攻桂林。7月下旬,别动军第七纵队夜袭桂林以北的湘南重镇祁阳,一举攻占,使桂林日军军心动摇,于27日被迫放弃桂林,向全县收缩。总之,别动军在中国陆军第二、三、四方面军反攻邕桂柳的作战中功不可没。^①

五 简短的结语

由上可见:第一,中美合作所是一个抗日机构而非反共机构。帮助中国、共同对日作战,是中美合作所成立的出发点;这是战时反法西斯盟国、盟军之间军事合作的一种形式。该所在华期间的活动,包括用先进设备和理论训练中国电讯、气象、侦译、研究分析、情报工作、医务、外语翻译、后勤保管等各方面技术人员,用先进战术、技术、设备帮助中国训练敌后游击队,用先进武器装备中国敌后游击队,组织中美联合游击队直接开展抗日敌后游击战,以及本文没有详述的从事破译日军密码,搜集日军情报,搜集中国大陆沿海气象潮汛资料,策应美国海、空、陆军对日作战,从事敌后经济、心理、政治作战等各种活动,都对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应当得到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中美合作所的设备、技术在抗战胜利后被用于国共内战,既非中美合作所成立的初衷,也非1946年即撤销了的中美合作所本身所能够控制;至少是与其并无任何直接关系,不应由此而否定中美合作所本身。显然,过去大陆对该机构的评价和宣传,过于偏颇或大部失真。当然,中美合作所的美方领导人梅乐斯确实具有亲国

① 以上均参见《南战场追击》,第11-12页;张霁芝:《戴笠与抗战》,第404-405页;费云文:《戴笠的几个战场》(五)。

反共的倾向,但这仅仅是他个人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情绪,与战时美国对华政策没有关系;而且他的反共情绪并没有使他作出违反中美联合抗日大局的行为。就目前资料所及,没有发现中美合作开展过反共宣传或反共活动。^①与梅乐斯类似,美国空军的陈纳德同样具有亲国反共倾向,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充分肯定“飞虎队”对中国抗战所作的贡献。

第二,中美合作所的工作内容不仅是搜集军事情报,还包括相当规模的敌后游击战争,尤其是第二种突击、袭击的游击作战形式,已经超出了情报工作的范畴。其实戴笠与外国合作的初衷,就是希望利用外国先进的武器,装备一支强大的武装部队,既可配合、掩护情报工作,又可改变军统只有情报机构和情报人员、没有军队的现状,借机增强军统的实力。^②正如中美合作所供应部美方负责人屈莱顿中校 1946 年 1 月向赴上海调查的美国国会海军委员会汇报时所说:“海军供应中国方面的东西,价值约为 1100 万美元。我们所交给他们的供应品,几乎有一半都是枪械。我们的工作,最初的目的虽然是在取得情报和气象资料,而并不是在作战的,但在最后,我们所用的武器,平均每一件将近杀死两个日本

① 有美国学者说梅乐斯亲自参加了戴笠主持的审讯政治犯的活动,事后政治犯遭到活埋。〔美〕迈克尔·沙勒著,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241 页。但这种说法并无确实根据。实际上,中美所在歌乐山办公时,同时存在但搬迁到渣滓洞的原白公馆集中营,并不属于中美合作所管辖,对外国人也是保密的,因此梅乐斯参加集中营审讯政治犯活动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梅乐斯则说他们当时奉到命令:中美合作所的“美国人员,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绝不可与这些‘土匪’作战”。此处“土匪”指的是在华中地区活动的中共武装。参见梅乐斯:《另一种战争》中册,第 602 页。

② 良雄:《戴笠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92-203 页。

人。”^① 梅乐斯也说:游击队的建立,最初只是“兼操副业”;但两年半后,中合作美所已经训练了 1.5 万名游击队员;到 1944 年底,则拥有了别动军等 7 个游击纵队、一个长江突击队,以及忠救军 4 个纵队;即中美所拥有了一个“实力相当可观的……游击部队……在 1945 年初,我们掌握了强大的‘武器’,就是由人数庞大继续增长的中国游击健儿,和一群像强力酵母一样的美国人合作而成的武力”。^② 这就是说,中美合作所成立的初衷,确是为了搜集军事情报;但随着游击部队的培训和组建,敌后游击战争的展开,该机构的工作内涵得以扩大,其性质遂发生转换。既然其援华物资的一半是用于作战的枪支弹药,而非用于情报工作的电讯、气象等设备,我们为什么要对作战部分视而不见、不予承认呢?因此笔者认为对中美合作所更准确的定位应是一个跨国军事合作机构,而非仅是一个跨国军事情报合作机构。

中美合作所本应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亮点,不幸却误变为一个“污点”。大陆迄今尚缺乏对中美合作所客观、详尽、科学的研究,这是令抗战史、二战史、中美关系史学界遗憾的事情。在抗战爆发 70 周年的今天,我们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还中美合作所抗日的历史以本来面目,希望本文能对此有所推动。

(作者洪小夏,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博士生)

(责任编辑:刘兵)

① [美]梅乐斯:《另一种战争》下册,台北:新生报出版部译本,1981年第3版,第928页。

② 梅乐斯:《另一种战争》中册,第565页。